

利瑪竇在肇慶的遭遇及其啟示

陳大同*

利瑪竇及其耶穌會傳教團終於得以打破壁壘，進入肇慶建立傳教會所僊花寺，滿懷勝利的希望。但是前後不過七年時間，經歷過多次風波之後，終於帶着憤懣和沮喪而轉移往韶關。類似的遭遇其後在韶關、南昌、南京和其它地方也曾有不同程度的重演，但是不如在肇慶那樣典型。因而利瑪竇在肇慶的遭遇，具有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意義，對其研判之啟示，對認識當今世界上的焦點問題也有着參考價值。

政治上的戒備

在准入肇慶建立傳教會所的問題上中方與耶穌會各自有所戒備，這是不言而喻的。祇是耶穌會的進展頗為順利，沖淡了中方戒備的色彩。因而在頭六年，耶穌會傳教團與駐肇慶的兩廣總督府、廣東省、嶺西道、肇慶府的長官和有關官員以及到肇慶公幹的其他官員，大體上都以禮相待，保持着良好的關係。當中執掌軍政權柄的兩廣總督先後有陳瑞、郭應聘、吳文華、吳善、劉繼文等五人。前四人任內沒有出現僵局，其中吳文華、吳善兩任內更是平靜；祇是到劉繼文接任之後，一改故態，採取了強硬措施，限令僊花寺關閉，利瑪竇及其傳教團轉移至韶關，從而引起利瑪竇的強烈不滿。三年後的萬曆二十年（1592），劉繼文調職往北就路經韶關，利瑪竇上門拜見，不久劉繼文在途中病逝。利瑪竇有着異常的反應：第一，認為他“是個貪婪小人”⁽¹⁾，“是靠賄賂和饋贈並通過他的密友的政治策劃，才得以晉陞的”⁽²⁾；第二，說“他當時當地就被解除了一切職務，並且罰款四萬金幣作為贓款而上交國庫”；第三，他利用僊花寺改建為自己的生祠。

關於這些指摘，情節與從其它文獻所瞭解的有出入，其中有的細節在利瑪竇自己的說法中也前後不一。關於第一、第二兩點，劉繼文回調朝中任戶

部侍郎，說不上是晉陞。因為他任兩廣總督時就帶着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銜。這就使得靠賄賂和饋贈才得到晉陞上京的說法失去了前提。何況劉繼文在仕履上有着清廉的業績。肇慶現在有立於萬曆十八年的〈嶺南平寇碑〉和〈平海碑〉，及立於後一年的〈兩粵督撫司馬中丞劉公祠記〉，對其操守和在兩廣的業績都加以肯定，其中說：“公建節撫西粵，菲己恬素，以吳處默貪泉之歎自誓，藩臬郡邑吏，歛然向風。”此前任浙江省參政，“考滿，與海瑞並稱為天下清官第三”。⁽³⁾關於第三點建生祠的問題，實際上是由當地士紳發起，在劉繼文離任後才興建，基址祇利用僊花寺的一部分地皮，並非全部佔用，這在當地的文獻與天主教史料都有相同的記述。

徐朔方教授認為，天主教著作關於劉繼文“以賄賂、送禮和鑽營、籠絡得到高陞”，及其在離粵進京途中被罷官、抄沒而死等情節，於《明實錄》得到證實。⁽⁴⁾所引的兵科給事中王德完的劾疏，劉繼文在申辯中一一否認。同科許子偉再嚴辭申斥劉繼文狡辯，但所得“有旨：着厂衛五城嚴刑緝治”，並無判決的刑罰記載。如果確實執行那樣的重刑，上述三道由大批官員署名的碑記應銷毀，不能保存。

可見把限期轉移往韶關歸咎於劉繼文的蠻橫和品行卑劣，不足以構成主因，要害在於存在着政治上必須戒備的背景。

*陳大同（1931-），廣東省肇慶學院退休教授。

(一)兩廣的動亂仍然不時發生。“廣東政局長期紊亂是明朝政府僅次於‘北虜’的心腹大患。”⁽⁵⁾萬曆初年，雖然以平定羅旁瑤亂為標誌的平亂大戰役結束，但兩廣的亂事並沒有完全停息。王泮到肇慶任職以來，“東抵羅旁，諸瑤出沒不時，不容一日弛備以嬉”。⁽⁶⁾就在羅明堅、利瑪竇初來肇慶的萬曆十一年、十二年，王泮就參與牽涉兩廣的“府江、懷賀之役”，圍剿懷集、封川、開建一帶的嚴秀珠、車延惠等的叛亂隊伍。特別是萬曆十七年韶州、南雄兩府發生僧人李圓朗、黃辛滿為首以“妖術”蠱惑群眾的叛亂，“持左道愚煽黔首”，劉繼文新接任兩廣總督，當即着力對付，“設策擒捕之”⁽⁷⁾。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動亂，更引起劉繼文的注意。同時南海上和沿海地區自嘉靖年間以後局勢就相當動盪，倭寇、海盜、內地亡命者，與葡萄牙的不法商人、殖民主義者往往勾結，狼狽為奸，糾合武裝，橫行海上。⁽⁸⁾

(二)境外潛伏着向中國發難的圖謀。“其一二羯夷讐孽，伏萑苻，竄島嶼者，動輒尉佗、劉襲，自雄負而反，與西粵相輔車唇齒。”⁽⁹⁾“羯夷”是對外國人的蔑稱。“伏萑苻，竄島嶼”，含有包藏禍心的外國人在潛伏伺機陰謀竊發的意思。事實上，就在僊花寺落成的1584年（萬曆十二年）6月25日，澳門耶穌會長法蘭西斯科·卡布拉爾致信西班牙國王菲力普二世，進言武力征服中國，透露為此一直在搜集情報，反復申述“有正當理由向他們發動戰爭”，並指出“神學家對此已有廣泛的討論”。與此同時，當年12月，印度孟加拉主教卡耀也向西班牙國王上書，鼓動通過武力征服中國。⁽¹⁰⁾對於這樣的密謀，中方不大可能詳細瞭解。但是嘉靖年間，“葡萄牙海盜商人與倭寇、中國亡命歹徒相勾結，多次竄犯我粵、閩、浙沿海，屢遭嚴厲打擊”⁽¹¹⁾，劉繼文在任廣西巡撫之前任福建布政使，這種嚴峻的事態不能不留下印象。

(三)對耶穌會傳教團駐在肇慶的流言紛傳，事端頻生。廣州和肇慶都有種種流言，其中說到僊花寺那一條輕舟與澳門常來常往，向葡萄牙人傳遞消息。正在編纂《肇慶府志》的葉春及更認定“夷僧闖

入近郊，創招提，奉天主，以左首惑民，為島夷中訶”⁽¹²⁾。加上官員與耶穌會傳教團之間進行的洋貨交易、饋贈又容易引起是非，都可能成為朝廷中那些御史、給事中等言官參奏的材料。這些不安定、有風險的因素，不能不預作應對。

將這種情勢與劉繼文處置耶穌會傳教團駐地的原則聯繫起來觀察，不許在政治軍事重鎮肇慶和廣州，祇准在離海岸較遠的韶關或廣西，核心就在於地區的安全，要從政治上進行戒備。當然，西班牙國王並沒有採納武力征服中國的建議，劉繼文那樣的戒備顯得有點過度緊張。

觀念上的齟齬

利瑪竇在肇慶的七年間全力為天主教傳道，想方設法向盡量多的人宣講天主教的義理，並且針對所認為流行着的儒、道、佛三種教派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貶抑或抨擊，其中抨擊最多的對象是“偶像崇拜”。當時肇慶正處在建設高潮之中，除了興建水利設施之外，還實施幾宗大型的文化建築工程，在西江南北兩岸分別興建崇禧塔、文明塔，修建肇慶府和高要縣的“兩學”，重修淵源於禪宗六祖惠能的梅庵，聲勢壓過了僊花寺的建築。這些廟堂塔院或多或少有着利瑪竇所稱的“偶像崇拜”，他都不願樂見，但除了崇禧塔與僊花寺毗連引起風波之外，其餘並沒有因此而發生矛盾，引發衝突，甚至神父巴範濟、羅明堅初次來到肇慶時，被安排入住天寧寺而相安無事。當時肇慶城內外“兩學”、佛寺、道觀四布，與天主教對比勢力懸殊，但是雙方和平相處。這顯出肇慶原有的宗教和信仰、觀念、意識，與天主教基本上和大體上是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

但是宗教、信仰都屬於主觀範疇，按照差異就是矛盾這樣的認識，基於觀念、意識的歧異，積累到一定程度，如果矛盾不能及時化解，那麼衝突就是難以避免的。崇禧塔與僊花寺之間發生的風波，實質就是觀念、意識上的齟齬。對於這一點，《利瑪竇中國割記》、《利瑪竇神父傳》並沒有記述，今天進行分析，或者有助於把觀察引向深入。

原來從萬曆初年起，經過士子們的廣泛醞釀，向官府積極爭取，肇慶府內有“三浮屠”之建。⁽¹³⁾就是從萬曆十年至十六年，除肇慶建崇禧塔、文明兩塔之外，高明縣也建文明塔，以造成文場興旺的風水，“圖文運之昌”，使“濟濟多士，應運而生”。其中崇禧塔費銀三千多兩，比僊花寺多五倍，是當時府內最大的建築工程。塔身從底層至第五層都有佛龕，共四十六個。基座八面鑲貼着的石浮雕“二龍戲珠”、“鯉躍龍門”、“麒麟獻瑞”等民間信仰的祥瑞圖像，又帶有道教色彩。因而整座塔整合着儒、佛、道三種文化色彩，寄託着舉業告捷、文場振興的願望，成為當時從知府、知縣、士子以至社會各界注視的焦點。正當壯偉的高塔成型的時候，僊花寺卻在腳跟冒出來，這是以譚論為代表的建塔紳董所不樂見的。加上廣州方面傳來的流言中又有“番塔”、“洋人塔”之類不實的說法，更使對耶穌會傳教團的不滿情緒上昇。利瑪竇沒有掌握本地人士熱望科舉業績振興的迫切心理，這樣的認識上的歧異，導致觀念上的對立深化，從而癥結難解。

科技上的認同

利瑪竇來華前對科學技術上的多門類學科和工藝都掌握了穩固的基礎知識和扎實的基本功。為了推進適應性的傳教，在科學技術和學術上預作了準備，刻意修習了16世紀新興的科學技術，因而對這一方面的動態、資訊及時作了收集並加以掌握，具有運用前沿技術的能力。肇慶是他進入中國內地的第一站，所展示、推介、傳授和應用的科學知識、技術及其製品，當中大多數是在中國首次出現的，因而具有開創性，有着重要的意義。

建築：僊花寺這幢倣歐式的建築物外牆砌有磚飾，有排列整齊的窗，又有安放時鐘的鐘樓，這是中國傳統建築所沒有的。

天體知識和模型：有天球儀、日晷、星盤等等。

地球知識和繪圖、模型：有地球儀、世界地圖。所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不但在地圖本身具有

多方面的首創意義，而且所體現的世界地理知識，對中國人科學認識世界作用巨大。由於圖上對中國的海岸線、城市山脈和水系繪得比較翔實，也有助於認識自己的國土，所使用的投影作圖法比中國原有的繪圖法先進。中國無疑也有悠久的地理測量和地圖繪製歷史，也曾世界領先，如近年發掘的〈大明混一圖〉以明朝版圖為中心，東起日本，西達歐洲，南蓋爪哇，北盡蒙古，所顯示的非洲地域圖，要比歐洲人最早的非洲地圖先一百多年。專家推斷該地圖繪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¹⁴⁾，認為這是古代世界地圖，比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早近二百年。不過該圖並沒有來得及反映世界地理大發現後對地球的認識，理論指導和繪製技術也相對落後，這是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的。以上兩項是利瑪竇向中國傳播歐洲的先進文化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個方面，都先在肇慶開創和奠基。

鐘錶：西洋鐘錶是機械裝置而成的計時器。萬曆十年（1582），神父羅明堅和巴範濟首次獲准到肇慶時，就將一個帶車輪的大自鳴鐘送給兩廣總督陳瑞。它是中國內地第一次出現的西洋機械鐘錶。此後利瑪竇在肇慶多次展示和贈送這類鐘錶。其中萬曆十二年間，分巡嶺西道員王泮託往澳門籌款的羅明堅以善價定做一個時鐘，不料款領不到，無法把時鐘買來，祇得把印度果阿籍的製鐘匠帶回肇慶。王泮馬上把城裡兩名最好的工匠找來協助，終於把時鐘製成交給王泮。這是中國內地有中國工匠參與製作的第一座歐式機械鐘錶。《利瑪竇中國割記》多次描述肇慶的官紳百姓對時鐘驚奇的情狀。其實近年中外學界揭示，東漢永初年間（107-113）著名科學家、文學家“張衡就製造了堪稱世界第一臺的有齒輪的機械鐘”，中國“在世界上是首先製造機械鐘錶的國家，後來傳到歐洲才有歐洲的鐘錶製造業”。⁽¹⁵⁾與此類似，利瑪竇在肇慶所展示和饋贈的日晷、砂漏，中國原來也有，而且歷史更久遠，不過可能不及當時歐洲所製造的精緻。這些歷史真相，今天有必要回歸本來面目。

文藝上的共鳴

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傳教團在肇慶所展示的西洋美術、西洋音樂和印刷品中的藝術，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也曾引起強烈的反響，其中有的影響深遠。僊花寺本身就是一座歐式的綜合藝術品，所展示的美術品多色多樣，天主教人物畫、塑像、浮雕、石刻、插圖、圖案、裝飾，連同圖書的裝幀、編排、印刷，都顯出與中國的風格、色彩迥然有別，具有更令人產生美感的魅力。僊花寺不時奏樂歌詠，吸引着聽眾“也羨慕我們的樂器，他們喜歡它那柔和的聲音和結構的新穎。”⁽¹⁶⁾

耶穌會傳教團展示的科技藝術品和科技製品所顯現的美感，在途經肇慶逗留的文學家湯顯祖身上反響特別強烈，他不但寫詩抒發深沉的感受，而且將在肇慶與利瑪竇會晤所獲得的印象和體認，與在澳門所作的觀察和思考，滲透在戲曲傑作《牡丹亭》上。

湯顯祖在肇慶所作的〈端州逢西域西生破佛立義，偶成二首〉詩中的“西域兩生”，徐朔方教授認定指利瑪竇和特·彼得利斯神父（或作裴德立、石方西）這是準確的。他們因為韶關的傳教團被匪幫在夜間破門強搶，兩神父並被打傷，到肇慶的嶺西道應訊，在萬曆二十年（1592）春天來到肇慶。這時湯顯祖從貶官處徐聞縣北返任職，途經肇慶，因而得以會晤。詩的第一首吟詠耶穌像：“畫屏天主絳紗籠，碧眼愁胡譯字通。正似瑞龍看甲錯，香膏原在木心中。”說耶穌面帶愁容，外表像龍腦樹表層錯雜粗糙那樣不大順眼，但樹幹心間卻蘊藏着芳香的龍腦香。第二首吟詠兩位神父，呢稱他們是“生”、是“子”，意思是歸於學人人類。後兩句又把他們置於僧佛之外，看作是從遠道履奇跡、持金寶作信物的友好使者，是善類，無可懷疑，表明湯顯祖對利瑪竇及其同伴不但友善，而且信賴，還有幾分敬重之意。至於“黃金”的含意，徐朔方教授認為“可解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這些洋商遠涉重洋為的是發財致富；二是指當時人認為歐洲傳教士掌握煉金術。”⁽¹⁷⁾關於第一，稱為“兩生”“二子”，實際上已不涉商；關於第二，當時確有人這樣看

待，肇慶就有這樣的流言，不過肇慶所說的“黃金”常同“寶”混同起來，而所稱說的“寶”實際上又是指那些三稜鏡、日晷、星盤之類稀罕的科技製品，正如〈牡丹亭·謁遇〉所描述的澳門多寶寺的“寶多羅羅”那樣。正因為這樣，表明這兩首詩與《牡丹亭》對耶穌會傳教團的認識有同源的痕跡。徐朔方教授認定《牡丹亭》“戲曲明顯地帶有他在肇慶、澳門會見利瑪竇和其他傳教士及外商的印象”⁽¹⁸⁾。這是將近三十年前中肯的論斷，到今天有更多的事實證明他在肇慶與耶穌會傳教士的接觸，在肇慶“蕩舟星巖遊”、“夢星乘槎是此年”、“留題共醉星巖客”這些嶺南風光部分，連同“多寶”“寶多”、聖母像和何仙姑等“南海女子”所觸發的“西方美人之思”，熔鑄成《牡丹亭》奇妙的構思、濃豔的幻境和“至情”的浪漫主義情境。

上述得出的啟示，大多可以與國際關係、國際交往的現實對應。這樣一項深具價值的歷史文化必須認真總結，提取其中有益的成份供當世借鑒。

【註】

- (1)(2)(16) 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割記》，何高濟等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33；259-260；216。
- (3)(6)(7)(9) 肇慶市文物志編輯委員會：《肇慶市文物志》，1987年，頁102-179；126；102；102。
- (3) 臺灣中央圖書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859。
- (4)(17)(18) 徐朔方：〈湯顯祖和利瑪竇〉《文史》第12輯，1981年，頁273-281。
- (5) 顏廣文：〈張居正治粵方略評析〉，北京《歷史檔案》，2004(4)，頁82。
- (8)(11)(法) 裴化行：《利瑪竇神父傳》（上），管震潮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譯序（5-6）。
- (10) 顧衛民：《中國天主教編年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80-86。
- (12)(13)(明) 葉春及：《石洞集》，四庫全書，第128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86-651。
- (14) 李宏為：《大明混一圖引起世人關注》〔J〕，歷史檔案，北京，2004(1)，頁133-134。
- (15) 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頁157。

〔本文原為第66期之特輯“利瑪竇與肇慶”特約稿，因截稿逾期現予以補刊。——編者〕